

地举办科学讲座，讲课时配有实验表演，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为我国兴办近代科学教育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格致书院开办的同年，徐寿等创办发行了我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格致汇编》。刊物始为月刊，后改为季刊，实际出版了七年，介绍了不少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在晚年，徐寿仍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于译书、科学教育及科学宣传普及事业上。1884年病逝在上海格致书院，享年67岁。

四、中国留学第一人

——教育使节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和开拓者。他是中国的哥伦布，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他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政治救国为己任，谋求中国社会的革新。他竭力主张并促成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后来投身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在晚年的时候，他又倾向革命，拥护民主。他一生顺应历史潮流，对近代中国进步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荫，号纯甫，1828年11月17

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生于广东青山县南屏镇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容丙炎，依靠租种三亩土地和打鱼为生。容闳排行老三，全家兄弟四人和父母六口，一起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南屏镇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1835年，容闳7岁时，他父亲通过熟人将容闳送到澳门一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创办的教会女校学习。这样，未受过一天中文正规教育的容闳首先接受了西学的启蒙。

郭士立夫人是一位“和蔼仁厚、视之如母”而又要求严格的基督徒教育家。她不让男女学童一块玩耍，男生中年龄最小的容闳被她安排在女院中。每天上午上课，下午集合，晚饭后还有晚课，到九点钟才休息，平时自由惯了的容闳对这种繁重的学堂生活不能适应，在入学不久，就策划了一次七人集体逃学事件。当七名男女学童划船接近香山南屏所在的彼德罗岛时，郭士立夫人所派的小艇追上了他们，七人全部捉回学校接受惩罚。

1839年，郭士立夫人所办的女校因经费困难和鸦片战争即将爆发而停办，容闳因此辍学归家。第二年，容闳的父亲不幸逝世，家庭经济愈加困难，12岁的容闳和他的年岁稍长的哥哥、姐姐不得不谋求家庭生计，于是，在家乡做一些小买卖。因他会几句英语，未及一年，就被一位在澳门做事的邻居推荐到澳门一个传教士印刷厂当童工。四个月后，1841年，又在郭士立夫妇的好友会信博士的帮助下，再次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士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

月在澳门创建的。校长勃朗先生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得过神学博士学位。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进校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中国学生，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由于考试总是第一，得到布朗的赏识。直到1846年，容闳在这里受到系统的教会教育，他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接受了崇尚西方的思想和宗教意识。

1847年1月，布朗夫妇回国，带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同往。到达美国后，进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当时，虽有传教士的资助，但经济依然非常困难。因此，容闳除上学外，还做工以维持生计，就这样开始了艰苦而紧张的留学生活。

容闳身在美国，却有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由于家乡地域的特殊环境，他自幼就目睹了入侵者在家乡的侵略罪行；生活的艰辛，使他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到美国后又亲眼看到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呈现的文明强盛，容闳深感祖国的落后，于是把在美国读书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当成是报国的一种力量储备。“借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他认识到教育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一切，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

重于财富。“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①他虽身在美国，却不能忘怀祖国，“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随着学业的进展，他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②正是这种责任感，容闳不盲目屈从于外国，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等待时机报效祖国。

留学两年后，学费没了着落。同来的黄胜因病提前归国，黄宽接受了香港的几位英国老板的资助，条件是在孟松学校毕业后，前往英格兰省爱丁堡大学学习专科。容闳拒绝前往，他这时一心想考耶鲁大学。孟松学校校董表示愿意资助他进耶鲁大学读书，条件是毕业后“归国传道”做教士。容闳认为教士会限制他将来报国，断然拒绝，表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③1848年夏，通过布朗的活动，容闳坚定求学的精神博得了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的同情，答应拨少部分钱资助他上大学。于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容闳进入了耶鲁大学深造。1854年，容闳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成为这所大学第一个中国籍毕业生。

学成归国

随着容闳大学毕业，向美国派留学生，学习美国的社会

^{①②③}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8页、第22页、第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就成了他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在容闳看来，如果中国人能够像他那样接受美国的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他们学成归国后对中国进行改造，就能使中国变得发达强盛，所谓“以西方之学术，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带着这样的思想，1854年11月13日，容闳从纽约乘船回国。

最初回国，容闳被看成“另类”。他的外表是中国人，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没有中国朋友，接触的大多是洋人，再加上他“久居美洲，于国语言，几尽忘之”。很难为同胞接纳。虽然如此，他始终没有改变对祖国坚贞不渝的爱。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曾作数次努力，奔波数年却到处碰壁而以失败告终。

1855年，他在广州找到美驻华公使伯驾，企图通过结识中国上层官僚，派留学生赴美，没有成功；同年，容闳前往香港，希望遇到清廷要员，支持其“教育计划”，又遭失败。

1856年，容闳到上海海关当译员，当得知中国人永远不能担任总税务司时，愤然辞去这一高薪之职。他说：“予之生于斯世，既非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①一洋人公司让他当买办，容闳认为作为中国人只有为国家效力的义务，而不能成为洋人手下的奴隶，买办是“洋行中奴隶之首领”，断然拒绝。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3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他怒打了一个戏弄侮辱他的苏格兰人，因此名声大振。但通过此事，容闳感慨万千，“盖自外人辟租界上海以来，侵占我治外法权。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凌侮，时有所闻，然从未有一个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此实由于中国人赋性柔和，每受外人骄恣，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①

此外，容闳回国后，曾打算投奔太平天国。1856年在香港当通译期间，他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那时，洪仁玕是伦敦布道会的成员。洪仁玕曾对容闳讲过，希望两人以后能在中国内地见面。洪仁玕于1858年先期离开香港，次年4月抵达天京。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内讫之后，“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天王洪秀全加封他为干王，派他总理朝政。1860年，容闳在上海得知洪仁玕已经到达天京，就想找个机会，也去访问太平天国。11月6日，容闳和另外三个人，其中两名是外国传教士，一同从上海乘船出发，前往太平军辖区。容闳在自传中回忆：“我去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太平军的性质，他们这批人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使我的宿愿得以实现。”

容闳一行四人于1860年11月18日到达天京。到达天京的次日，容闳谒见干王洪仁玕。他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政纲：1.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 设立武备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3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 建设海军学校；4. 建立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 创立银行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6.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7.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洪仁玕对容闳的建议非常重视，认为同他自己提出的《资政新篇》是相一致的。容闳到过国外，熟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更有助于实施他所提出的建议。两天之后，洪仁玕又请容闳到干王府详谈。容闳称赞干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远远超出其他诸王，甚至比天王还要丰富很多。他们又对七条建议逐条分析研究，何者最要，何者最佳，侃侃而谈，一致认为都有实行的价值和必要。但是，洪仁玕向容闳谈了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太平军正与清军在安庆一带作战，诸王都在各个战场上带兵打仗，如果要施行这些建议，必须等诸王回天京讨论同意，并在条件许可下逐步实施。这就是说，建议很好，但目前无法付诸实践。

容闳在天京住了一个多月，经过全面考察，对太平天国产生了怀疑，不相信太平军会使中国复兴。干王想把容闳挽留在天京，协助自己工作，还派员赠送给容闳一枚印有“义”字的官印，打算封他为“义”爵，这是太平天国的四等爵位。容闳亲赴干王府，当面谢绝这个官爵，并向他辞行，只要求发给一张护照，准许他到太平军辖区旅行和经商。洪仁玕没能挽留住容闳，只得答应他的要求。容闳一行于1860年12月24日离开天京，返回上海。

出访太平天国，希望通过洪秀全、洪仁玕实施其“教育救国”的方案失败后，1861年，容闳受聘为上海绿茶商行的代理人，做起了茶叶商，希望发财致富后，有资金有能

力自派留学生出国。在他看来，“太平军既不能改革中国，也无法使中国复兴”，因此只得把发财致富作为自己当前的首要任务。

一次，容闳在上海得知，安徽太平军辖区内有大量绿茶积压，有谁敢冒生命危险去收购并运回上海，就可致富。他于是决定一试，因为他有一张可到太平军辖区旅行和经商的护照，又认识太平天国的领袖，洋行老板也同意让他带四万两银子，配备十几名助手和保镖，分乘两条大船，直奔芜湖。他们用了半个月时间收购绿茶，第一批运回上海的茶叶，载满15条船，由一部分保镖护送；第二批运回上海的茶叶装了12条船，由容闳亲自押运。

这样，容闳在安徽太平军辖区用了半年时间，共收购和押运六万五千箱茶叶回到上海。由于他拼命挣钱，以致生了一场大病，躺在病榻达两个月之久。这场大病使他清醒过来，他在自传中写道：“那两个月的病，粉碎了我想发大财的一切念头。”病愈之后，他到九江暂居，做茶叶经纪人；半年之后自己开业经营茶叶，约有三年之久。

效力曾国藩幕府

1863年初，做茶叶生意的容闳忽然接到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张斯桂从安庆的来信。张斯桂当时在两江总督曾国藩那里当幕僚。曾国藩的湘军1861年9月攻陷安庆，大营就驻扎在安庆。曾国藩很重视西方国家制造的枪炮，打算开设机器厂，引进外国设备，制造洋枪大炮。为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知识分子，容闳在上海结识的一些朋友，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当时都在安庆曾国藩幕中。他们曾向曾国藩推荐容闳，讲了容闳长期在国外读书的经历。曾国藩闻名

后很想一见，特命张斯桂写信请容闳到安庆。但当时正值新茶上市，业务繁忙，特别是容闳担心曾国藩知道自己到过天京，与干王有联系，还在太平军辖区做过生意，于是，复信表示谢绝。

两个月后，容闳又接到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里面还附了容闳另一好友李善兰的一封信。李善兰是位数学家，他在信里解释说，他曾在曾国藩面前提到容闳受过西方正规教育，有爱国爱民之心，“急欲为国服务以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之国家”。曾国藩听后极感兴趣，想面见容闳委以重任。容闳还没来得及回信，李善兰和张斯桂又先后再次来信，要容闳放弃经商，前去安庆曾国藩幕府当幕僚。经过再三考虑，容闳确信曾国藩对他没有什么不利，决定前去投奔，希望通过曾国藩来实现回国时所抱的改革中国的教育计划。

容闳抵达安庆的第二天，就受到曾国藩接见。接见的场景在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里有一段生动的记述：“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早起，予往谒总督曾公。刺入不及一分钟，阍者立即引予入见。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观其笑容，知其心甚欣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目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予之二目者。……总督曰：‘予观汝貌，决为良好将材。以汝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予自信此时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当时，曾国藩已在安庆设立一个军械所，令华蘅芳、徐寿等试造船、炮。这次要容闳来，就是要他参与计议如何扩建一家新式机器厂。容闳提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机

器厂，应该以通用的和基础的为主，不宜专供特种用途。应当有许多制造工作母机的基础工厂。只要有了这样一家工厂，就可以此作为母厂，派生出更好的子厂来。他还指出，中国的原料和人工都比欧美低廉，有了一家母厂，就可花不多的钱在国内增设子厂和再生产了。虽然当时曾国藩要的是能直接制造枪炮的工厂，而容闳主张中国能够设立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两人想法大相迥庭，但曾国藩对容闳“以器制器”的主张非常赞许，决定派他出国购买机器。

两个星期之后，曾国藩正式任命容闳为出洋委员，派他到国外去采购所需各类机器。同时，曾国藩已命在上海的李鸿章，用四万两白银买进一外商的铁厂，在上海虹口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并引进苏州制炮局的一部分设备，先行开工。同时在上海高昌庙建立新厂。这就是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也就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容闳被任命为出洋委员后一星期，曾国藩再次召见他，授予他委任状，并赏给他五品军功。容闳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开始为洋务派服务。曾国藩一次发给他购办机器的款项达六万八千两银子，表示对他的完全信任。

1863年10月，容闳回到上海。经过一番筹备，1864年初从上海乘船出洋。这次容闳是绕道欧洲前往美国的，到法国的马赛、巴黎和英国的伦敦等地，参观游览，了解欧洲工业和社会状况。他大大增长了见识，也愈加相信教育的重要，认定中国要赶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靠当时中国的一套封建教育制度是根本无法奏效的。

容闳到达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南北战争尚未结束，许多

工厂还忙于生产美国政府的军工订货，致使他向一些机器制造厂订购机器时，遇到了困难。由于他在美国有不少朋友和老同学，通过这些关系，终于同马萨诸塞州菲奇堡的朴特南机器厂签订合同，为中国工厂制造一批工作母机。

到1865年春，容闳订购的各类机器均已备好，他命随行人员押运着从纽约绕道好望角，直达上海。他自己则从陆路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乘船取道太平洋回国。这次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共有一百多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

这时，曾国藩已攻破天京，容闳回国时，曾国藩正扎营徐州指挥“剿捻”。容闳遂前往徐州向曾国藩复命，还向曾国藩报告了这次到欧美，进一步了解到的西方国家工业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曾国藩对容闳按计划完成任务，表示赞赏和慰勉，命幕僚写了《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上奏，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候补”。

1865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授予容闳五品候补同知官衔，还任命容闳担任江苏省布政司衙门的译员。

当时任苏松太道的是丁日昌，他协助曾国藩和李鸿章办理洋务，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容闳在上海常在他的衙门出入，谈论有关改革中国和向西方学习的事，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从1865年11月到1866年5月，容闳在工作之余翻译了美国地理学家哥尔顿的《地理学》一书和美国法学家派森的《契约论》的大部分。1867年春天，容闳又倡议由中国人自己筹办一家轮船公司，向清政府呈上《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个章程提出在集股、管理、分红等方

面，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全部由民间集资开办，以自由竞争的精神发展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以利沿海与内地的通商，打破外国侵略者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自办轮船航运的倡议，可条陈上奏后，杳无音信。

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视察，亲赴江南制造局参观，容闳也在陪同人员之列。当曾国藩看到那么多新式机器自动运转，并制造出各种军工产品而露出喜悦心情时，容闳即乘机向曾国藩提出，应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给中国青年工人讲授机械制造原理，并给他们实习的机会，以期将来可以由中国人完全独立自主地管理这家工厂，使用、修理这些机器，不再仰仗外国工程师。曾国藩听后表示赞许。不久，这所机械学校就开办起来，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早期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力倡留学运动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浦安臣条约》规定，“中国人入美国公立学校”，可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美国人进入中国公立学校亦同。美国人可在中国指定地方设立学校，中国人也可在美国设立学校。这种教育交流的最惠国待遇，为容闳的派遣赴美留学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清廷上一条陈，提出四项建议：

（一）筹组合资轮船公司，由中国政府及人民投资，工作人员全为中国人，为营业发达计，政府要每年津贴，此项津贴由镇江、上海等地运往北京之漕米税款项下开支。

（二）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方式，先选派120人，分四批赴美，每年一批，计30人，

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约12至14岁。并选派中文教师同往，以期这批学生在美可以继续进修中文。学生在外国的食宿入学等事宜，设留学生监督两位负责管理。此项计划所需费用由上海海关税收项下提拨。

（三）政府宜设立机构，开采矿产，兼谋运输之便利。凡是由内地可以通达商口的，应修筑铁路，以利交通。

（四）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止外人干涉。任何教会，除有关宗教者外，无权管理中国教徒。

以上四项计划，在容闳心里，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二项，即选派青少年出国留学。这个条陈由丁日昌送呈军机大臣文祥，请他奏报。但是事不凑巧，文祥的母亲突然病逝，按照清朝陈例，必须回家服丧。文祥到家不久也去世。容闳的条陈没有上达朝廷，就被搁置了起来。

1870年春，“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特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位大臣驰往天津调停，处理善后。为方便对外人交涉，丁日昌邀容闳以译员名义同往。当教案结束后，容闳向丁日昌巡抚旧事重提，并请其商请曾国藩及其他两位大臣就近协助。结果四人联名将容闳的计划奏报清廷，丁日昌半夜亲自到容的住处将这一消息告诉容闳。容闳“乃喜而不寐，竟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①

1870年冬，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的奏折。曾国藩通知容闳嘱他开始着手筹备事宜。随后，曾国藩制订了派留学生章程12条，其要点是：挑选12岁左右的幼童120名，分四年

^① 容宏：《西学东渐记》，第9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派出，每年30名：幼童选定后，分别注册，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入外国籍，学成后亦不准谋别的职。命陈兰彬和容闳为“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监督，并带翻译和汉文教习，经费由两江海关洋税下提拨。

1871年，容闳奉曾国藩之命，开始办理招选学生事宜。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对外国事物不甚了解，清政府也总是宣传外国是“蛮夷之邦”，除了少数沿海口岸与外国人有所接触或是归国华侨略知真情外，老百姓都把到外国去当做“放逐”，谁也不肯轻易送子弟出洋念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加上把这些十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因此，仅招生工作，容闳就费尽了心机。第一批学生30名，在上海无法招满，不得不在香港续招，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例如，在香港物色到的一名学生詹天佑，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工程师，当时他随父母居住在广东南海，是经过在香港一个同乡向他的父亲劝说，并且答应将来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之后，他的父母才勉强同意让他到达香港去报名的。又如，招收的另一名学生邝荣光，是因为他的父亲曾在澳大利亚当过矿工，吃过外国人的苦头，知道没有文化被外国人瞧不起，也不容易谋生，所以才同意让他报名的。后来他也成为我国著名的煤矿工程师。

容闳所招收的第一批30名留学生，全都是贫寒家庭的子弟，没有一个是官宦的后代。出洋之前，学生家长都必须具结。詹天佑的父亲詹作民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1871年春夏间，预备学校在上海正式开学，由刘开成任校长。刘为曾国藩幕僚之一，协助容闳推行此项计划，后容闳赴美，安排第一批学生，刘在上海承担全部训练任务，前后四批均由他负责。是年冬，第一批幼童正在预备学校受训练，曾国藩在南京病逝。这时幼童虽还在国内，尚未跨出国门，但容闳长期筹谋促进西学东渐的留学教育计划已开始实施，曾国藩之死，对留学计划已无关大碍，但曾国藩对留学计划的施行却是功不可没。

1872年7月初，容闳先行只身赴美，为留美幼童安排住宿与学习场所。他来到美国东海岸康涅狄格州的新海汶，这里是容闳的母校、著名的耶鲁大学所在地。容闳造访了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与他当年的老师詹姆士·海德列教授，商讨幼童来美后的安排问题。他们介绍容闳与康州教育署长罗索布洽谈。罗氏表示非常欢迎中国留美幼童来康涅狄格，并建议将幼童们每二三人分为一组，先分别寄居在美国居民的家中，以便迅速学会英语会话与熟悉美国社会情况。容闳接受了这项建议并做了周密的安排。

1872年9月中旬，30名留美幼童抵达康涅狄格州，容闳将他们分成十多个小组，每组二至三人，由一个当地的美国家庭带他们回去。中国幼童在各自的美国家庭都得到很好的照应，在不知不觉间，他们的思想观念、言谈举止，渐渐背离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束缚。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这些变化引起了“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的震怒，时常与幼童学生发生冲突。陈兰彬认为学生的这些活动，是

大逆不道。他把这些学生召来大肆训斥，而容闳却多方加以庇护，两人之间因此产生了矛盾。陈兰彬坚决反对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认为一个文人脱去长袍穿着短裤在外奔跑，不成体统。他责令剪去发辫的学生遥向北京下跪请罪，重新留发；对于胆敢改穿西服或上教堂的学生，则视为悖逆行为。容闳称陈兰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孔门弟子，几乎代表一切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咬牙切齿地反对每一项改革措施和中国的任何进步事业”。

后来的学生中发生所谓西化问题的比第一批更多。例如，第二批赴美留学生中有个容揆，在美国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取了哈佛大学，被人告发已剪去发辫。陈兰彬立即取消他的官费，令其回国。容闳认为他好不容易考进哈佛大学，将来定可培养成才，于是暗中为他留下一笔费用，要他坚持在哈佛大学就读。这个学生后来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后出任外交官。容闳这些做法，大大激怒了陈兰彬，他不断地写信向总理衙门控告，要求撤消容闳职务，调回国内。

1875年，陈兰彬请假回国，由区岳良接任正监督。陈兰彬再次向总理衙门告容闳的状。这时，总理衙门正考虑在美国设立公使馆，同年12月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容闳为副公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派到美国的外交使节。但容闳任副公使，将脱离留美学生事务所的工作。为此容闳写信给李鸿章，请他要求朝廷收回这项任命。李鸿章接到容闳的报告，认为留美学生事务所除了容闳外其他人很难胜任，于是奏请朝廷批复容闳“以副公使而兼副监督之任”，让他得以继续负责留美学生的工作。新到任的正监督区岳良尚能与容闳配合，可惜时间不长，未满一年就辞

职了。

1876年，陈兰彬以新任驻美全权公使的身份前往美国，带去一大批僚属，其中有接替区岳良担任正监督的吴子登。此人也是翰林院翰林，满脑子封建守旧思想，又是陈兰彬的心腹。二十多年前，容闳曾与他在上海见过一面，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怪僻。”吴原是遣派学生留洋一事的坚决反对者，如今却被委任为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来管理留学事务。他一到任就向容闳公开闹对立，企图以正监督的身份压倒容闳。他对容闳的工作处处挑剔，还指责容闳纵容和迁就留学生，让他们少读书、多游戏，模仿美国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对中国教师不尊敬，不肯下跪、叩头，等等。吴子登断定长此下去，这批留学生纵能学成归国，非但无益于国家，并且有害于社会。

1880年10月，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暴力事件，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官僚抓住这一事件，对留美学生运动发起围攻，要求将留美学生尽撤回国。特别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实易沾其恶习”而建议从速解散幼童“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并声称：“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吴子登的上奏迅速得以批准。耶鲁大学

校长朴德亲自写信给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收回成命，让留学生继续学习，完成学业，清政府对此置之不理。从8月21日起，120名留美学生除因病故等原因的26名外，其余94名于同年11月，分三批乘火车自纽约至旧金山，然后乘船回国。有意思的是，留学生在旧金山候船期间，竟然与当地有名的奥克兰棒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大获全胜，令美国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虽然中国幼童赴美留学的事半途而废，这些留学生回到中国后，也饱受清廷的歧视与冷落，但他们胸怀报国之志，利用自己的才华，忠心为国效劳。他们中有17人参加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法海战（1884年）和中日甲午海战（1894年），其中有7人在海战中殉国。还有少数人在清末民初的政府和大学中担任要职，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当中有驰名中外的被誉为“中国工程之父”的铁路建筑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代矿业学家吴仰僧、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有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海军元帅并参加“中日海战”的吴应科和蔡廷翰及在“中法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海军舰长邝咏钟等等。

留美学生撤回后，容闳也在1881年被召回国。1882年他因照顾生病的美国妻子赴美，一住13年。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向国内陈述了他关于对日作战的想法。同年回国，先后受聘于张之洞和刘坤一，但都无所作为，时间也很短暂。他还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建立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建议，也都未被采纳。他对清政府更加失望。这期间他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参加了维新运动。他的住所成

了维新派领导者的聚会之处。戊戌变法失败，容闳也被列入清廷密令逮捕的名单，他化装逃往上海。1900年，唐才常筹划发动自立军起义，并于这一年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议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其后自立军起事计划失败，容闳逃亡日本，与孙中山结识，转向同情革命。后到香港，他的朋友兴中会的谢纘泰密谋在广州起义，准备推容闳为临时政府的总统，因事泄失败。1902年，容闳回到美国家中，仍同康、梁和孙中山保持联系，但逐渐转向完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容闳感到欢欣鼓舞，他致电孙中山表示热烈祝贺。孙中山也致电容闳说：“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回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正当容闳兴奋地准备回国时，宿疾复发，于1912年4月在美国去世，终年84岁。他在弥留之际，还谆谆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一定要回到中国，为他终生眷恋的祖国效力。后来他们都遵从父亲遗愿回国服务。